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

河南大学出版社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7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第7辑/苗长虹主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 2
ISBN 978-7-5649-0817-1

I. ①黄… II. ①苗… III. ①黄河流域—文化史—丛刊②黄河流域—
可持续发展—丛刊 IV. ①K292—55②X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2988 号

责任编辑 董庆超

特邀编辑 赵建吉 吴朋飞

责任校对 胡凤杰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314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顾 问：李学勤 冯骥才 陆大道 孙九林 牛文元
陈栋生 王 巍 马润潮(美) 李福清(俄)
戴福士(美) 吉尾宽(日)

主 编：苗长虹

副 主 编：高有鹏 牛建强 刘东勋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创琳	王蕴智	孙一飞(美)	许学工	刘彦随
李小建	李玉洁	李振宏	张大新	张云鹏
张新斌	杨云彦	杨伟聪(新)	杨朝明	侯甬坚
耿明斋	晁福林	秦耀辰	康保成	程民生
樊 杰	魏也华(美)		魏后凯	戴松成

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地理学会黄河分会

目 录

专论

- 传统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公共经济学解释····· 宋丙涛(1)
地权、资本与农业经济组织:一个基于比较案例研究的经济学分析····· 邓宏图(24)

经济与社会

-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 董栓成(50)
流域经济:空间特征、过程与机制····· 张侃侃 郭文炯(59)
资本流动、知识溢出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颜银根(70)

地理与生态

- 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朱士光(85)
黄河流域灾害环境变化与水资源安全····· 徐海亮(105)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构建····· 咎胜锋 李娇来(120)
竞争者非正式地方化学习、全球传言与农区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集群成长
——以神垕钧瓷产业集群为例····· 李学鑫 尤瑞玲 史本林(126)
地理透镜下中国回族社区的理论建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艾少伟(138)
1990年以来巩义市 LUCC 过程的演变及驱动机制
····· 许家伟 乔家君 海贝贝(152)

比较与借鉴

-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功能与总趋势
····· 姚士谋 潘佩佩 吕文 张艳会 薛凤旋(169)
江苏文化创意产业地域发展模式类型划分与发展思路研究
····· 孟召宜 沈正平 刘燕 殷薇(188)

学术信息

- 第四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国际论坛成功举办····· (201)
征稿简则····· (203)

传统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公共经济学解释^①

宋丙涛

摘要:文明转型的原因曾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由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影响,经济学未能很好地解释现代文明的产生过程。本文试图从人类更为原始的种群生存目标出发,讨论人类的集体经济活动模式与利他性的公共经济活动规律。本文用公共经济制度来定义文明,用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变迁来解释现代文明转型成功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得出结论,作为一种实现种群生存目标的制度选择,文明形态的转型实际上遵循着集体博弈的原则,所谓的现代文明转型,既不是技术的变迁,也不是产权制度的变迁,而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各个社会的精英有意构建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制度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文明转型;公共经济学

作者简介:宋丙涛(1965—),男,河南辉县人,博士、教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理论和产业革命史。(开封 475001)

一、引 言

“一般人所谈之西方文化,实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若希腊罗马之思想,实与儒家之思想,大有相同之处。”——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80页。

“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

^① 感谢厦门大学张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山东大学陈强博士、河南大学刘东勋博士给本文初稿提供的建设性建议,同时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下游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路径研究”(06JJD770009)提供的资助。

中古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25页。

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与现代文明转型的路径曾经吸引了无数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对传统农耕文明与重农主义的无知以及对重商主义的误解，一个能解释现代文明转型规律的经济理论一直没有出现，经济学长期停留在对转型之后的市场经济结构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精细化描述的阶段。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导致了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的关注（诺斯、托马斯，1999；诺斯，1994），并进而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诺斯，1999；诺斯、托马斯，1994），并用产权结构的变迁解释了产业革命的爆发。然而，荷兰的失败却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提出了质疑（Mokyr，1999、2000；Kindleberger，1975；Epstein，2000），加州学派的兴起更是瓦解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赖以存在的基础（Wong，1997；Pomeranz，1997；Shiue et al，2004；Goldstone，2012）。一个传统文明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经济解释仍然没有出现。

关于东西方文化与传统现代文明之间的对比，在经济学之外，目前比较流行的基本上是两种看法：一种是亨廷顿（2002）的文明冲突论，一种是米勒（2002）的文明共存论。在没有对文明与文化进行厘清的前提下，前者强调工业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因果关系，后者则否认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从而既无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指导，也无法对现代文明的未来走向提供借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研究甚至没有达到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早期关于东西方文明对比本质的认识（冯友兰，2000）。

本文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了文明的经济本质，并以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的规律为依据分析了从传统农耕文明到海洋重商文明、从海洋重商文明向现代市场文明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条件。本文的研究表明，农耕文明、重商文明与现代文明一样都是不同环境条件下比较成功的公共经济制度，而现代市场文明由于摆脱了马尔萨斯生存陷阱而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但现代文明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与新困境。本文试图以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为基础，以服务于需求结构的、以外生的自然环境条件与地缘政治条件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制度的变迁为主线，对人类文明转型的动力机制给出一个合乎理性的经济学解释。

本文的第二部分对文明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内涵进行讨论，在厘清与文化的差异的基础上基于政治与历史学界的学术传统，给出了一个公共经济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第三部分是本文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讨论传统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内涵及内在推动力。本文的第四部分是运用第三部分提出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英国现代化转型成功的原因，同时对上述理论给出一个实证检验。本文的第五部分是一个简短的结论。

二、文明和文明转型的公共经济学内涵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最迟在3000年前的东亚大陆与地中海文明圈就同时开始了（陈淳，2007），因此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任何其他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亨廷顿，2002）。但由于受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确实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英美的近现代文明才是文明，希腊文明才是人类第一个真正的文明

雏形(戈登,2005;易中天,2007)。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民主政治才是文明,而独断专制的君主制不可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更不可能是文明的起源。但对于已经有了民主政治的希腊与罗马为何会先后转向专制的贵族寡头统治,他们却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大多数的当代历史学家只是无奈地将之归于人性的堕落与历史的倒退。不过,当时的历史学家西塞罗却对这种“倒退”进行了赞扬,并清楚地指出了古希腊、古罗马民主政体被替代的历史必然性(摩尔根,1997)。很显然,希腊与罗马虽拥有民主政治,但他们自己却并不像今天的西方政客与学者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是文明,更不要说将之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准了。^①

那么文明的本质是什么?难道文明不只表现为民主,竟然也包含人人痛恨的专制政治?

事实上,对于文明概念的理解,近代的学者首先是受技术决定论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从文化开始的。著名英国学者泰勒(Edward B. Tylor,1871,《原始文化》)在其经典的定义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②在这里,不仅作为技术基础的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而且文明与文化是一个可互换的并称。

上述经典定义在文明与文化之间的混淆对学术界产生了长期的影响(赵林,2005;王锦贵,2004;冯天瑜等,2005),很多中国学者不仅始终认为中国在近代的失利是科技落后的结果^③,而且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时往往关注的是文化的差异(赵林,2005)^④。尽管中国人在近代的屈辱源于与传统文化无关的战争失利,但中国的学者不仅将之归结为东方文化的劣势,甚至还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上推至古希腊时期,并认为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因为近代的“思想、政治变革把许多新内容注入到传统的基督教价值系统中,从而使西欧社会完成了一场近代意义上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变革”(赵林,2005)。这种混淆不仅导致了对现代化转型的误解,甚至导致有些学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⑤因此,尽管从戊戌变法开始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和弘扬的争论就没有停止

^① 其实,“雅典政治的浪漫化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是很晚才出现的。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并且人们通常引用古代雅典的实例来说明民主的缺陷”(戈登,2005),雅典的陷落就是最典型的证据。相反,直到那时为止,专制政府一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效仿模式,不仅西方的文明发源地的古代希腊人、罗马人都羡慕地把东方的专制帝国称之为文明的社会(加亚尔、德尚等:《欧洲史》,蔡鸿滨译。海南出版社,2005年),而且东亚大陆的帝国专制文明也是从民主共和制演变而来的,并且未能实现文明演进的美洲各前文明部落普遍实行的也是部落民主制。

^② 转引自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编译:《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尽管政治体制曾经被反复讨论与尝试,但时至今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才是国际核心竞争力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④ 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李约瑟之迷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36、56页)。

^⑤ 这些学者以生产力决定论为基础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思想和方法是否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更具体地说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姜岩《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两作者之一)姜岩回应网上辩论: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3日10:25新浪科技)。

过(赵林,2005),但我们很少触及现代文明的经济本质,更没有指出中国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纵向传承关系与结合点所在。相反,我们习惯于在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把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或文明横向对立起来并强调文明的民主政治内涵,并且相对于我们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批判,我们对东方农耕文明长期成功的原因认识太少。^①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东西文明对比的本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同样未在文化与文明之间加以区分:“一般人所谈之西方文化,实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若希腊罗马之思想,实与儒家之思想,大有相同之处。”(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80页。)^②“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的,而是因为他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25页)

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不仅影响了对文明演变的认识,而且误导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文明转型的进程与方向。因为,受这些思潮与理论的影响,当西方的政治家试图向东方传播现代文明时,他们选择并带来的往往是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甚至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与宗教运动,而不是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以至于“在工业世界征服和同化农耕文明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泛西方化’的趋势”(赵林,2005)。该趋势在文化上全面否定本土文化,在政治上全面引入普选政治,从而导致民族性权威中心的丧失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推迟。更何况,全盘西化式的民主政治改革从未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获得成功,于是它们渐渐在经济理论上遭到了质疑(Kong, 2008; Acemoglu, 2008),以至于文明的文化与政治概念正在失去吸引力。

鉴于文明与文化的混淆已经带来了这么多的误解与误导,许多学者都试图厘清这两个概念。“德国社会学家巴斯将‘文化’界定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将‘文明’界定为‘人对自身的支配’。”(赵林,2005)还有许多学者通过追溯词源,认识到“‘文明’一词最初是与‘城邦’(polis)相联系的”(赵林,2005;冯天瑜等,2005),强调文明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是关于城邦组织与政治生活的公共经济活动的规则。“而‘文化’一词则源于‘耕作’、‘养殖’和‘崇拜’”(赵林,2005;冯天瑜等,2005),因此属于人与物的关系的私人经济活动方法范畴。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对文明的内涵逐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正如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总结的:“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②事实上,尽管有时人们会把技术标准与文化因素加上,但在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才是文明的象征这一点上大体得到了共识(朱乃诚,2006),并意识到国家作为“执戈捍卫之城”(冯天瑜等,2005)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防公共品的早期提供单位。

因此,我们认为,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组织发展到了一个较为高级的阶段,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明显提高,从而确保建立了该体制的民族能够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在与

^① 作为本文的一个基础,作者曾在几年前首先对中国的黄河农耕文明长期存在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了一个解释(宋丙涛,2008)。

^② 李玉洁:《先秦史稿》。新华出版社,2002年。

临近民族的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效率的提高是通过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因此第一个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表现为独立的、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化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形成,其核心标志就是规范的国家体制的出现。换句话说,随着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作为统治者与主权象征的国王和作为土地所有者身份的地主之间有了根本的区别,作为产权回报的地租与执行主权的报酬——财政收入渐渐开始分离。事实上,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公共经济体制的具体体现的国家体制本身不断地发生变化,但以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公共经济体制)作为人类文明诞生的标志却从未发生改变。无论是早期国家的出现,还是近代国家制度的变迁,文明的形态无不与国家体制的具体内涵密切相关。^① 如果认识到了文明的这些内涵,那么很显然发生在欧洲的近代工业革命与出现在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就都不可能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因为在近代国家在欧洲出现之前的两千多年以前,作为文明形态具体体现的规范国家体制早就在东方出现了。^②

同时,尽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生产工具特别是工具材料的改进一直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但无论生产工具有多么重要,只要它没能导致公共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文明就不会诞生。这个拥有先进工具的人类种群就存在着随时被灭绝的危险,所有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集体劳动的结晶——各种巨大的工程也就不可能被完成。因此,这些劳动工具作为一个技术的结晶,就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渐进性标志——不同文化的标志,而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性飞跃——文明出现与转型的标志。于是学术界普遍把这些工具与技术的标志称之为各种各样的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而只有在技术的变迁(比如青铜器)带来了国家与公共经济体制的专业化分工与效率的明显提高之后,我们才把此后的人类发展成果称之为文明,如青铜文明。并且在这些文明诞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那些未能实现国家建制与公共经济专业化分工的游牧民族的文化仍被称之为游牧文化,而不是游牧文明。在文明社会的内部,采取相同生产技术与方式的人群被称为同一个文化族群,生产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的则被称之为不同的文化族群,而所有拥有类似国家形态的民族则都被认为是文明的民族。

当然,文明与文化之所以被混淆,一方面确实是认识水平局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是西方某些人有意无意引导的结果。由于在文明的国家体制出现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维系种群的生存,而在确保种群生存的过程中,虽然生产技术的改进也一直是公共经济体制服务的对象之一,但在技术条件相对稳定的短期中,种群生存的追求主要体现为不同种群之间为了争夺资源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弗格逊,2007)。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对他们自己构建的有效率的公共经济制度天然地具有保密的倾向,特别是伊斯兰教长期拥有的相对优势,更使得基督教的欧洲不大可能把一个有效的新文明——新的公共经济体制拱手送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于是,当西班牙、葡

^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明的讨论集中在国家体制上是非常恰当的,而把文化与宗教当做核心却有点离题之嫌。

^② 许多当代的西方学者,甚至是史学工作者,不了解人类历史的广泛性,而把国家的出现确定为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进一步误导了文明演变进程的研究。

葡萄牙开始征服全球时,推广与传播基督教文化、遏制伊斯兰教就成了欧洲人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并且所谓的文化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数千年来不同种群之间生存竞争的持续,只不过欧洲人试图用宗教文化渗透瓦解对方文化基础与政治权威的方法来取代代价高昂的赤裸裸的征战而已,因为有效的政教合一的公共经济体制一直是伊斯兰教世界进攻基督教世界的制度基础。然而,不幸的是,欧洲人“把自己的文化影响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赵林,2005)的目标最终仍然是依靠英国人的枪炮与残酷的战争才得以实现的。

当然,能够让英国的枪炮所向披靡发挥作用的是他们自己构建的更为有效的文明体系——公共财政体制。然而,由于早期欧洲人扩张的目的仍然是与其他种群争夺资源,因此当英国人发现了一个更有效的公共经济制度与竞争手段时,他们当然不会把这个国家体制的秘密示人,更不可能在被他们打败占领的地区构建这个新型的公共财政制度或现代文明体系,从而为自己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即使对待自己的兄弟——美洲殖民地与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早期的现代文明成功者英国从来都没有想把成功的现代文明模式——公共财政体系传给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传统欧洲强国,甚至它也从来不愿意在自己的美洲大陆殖民地建立类似的公共经济体制(弗格逊,2007);相反,英国人利用自己先进的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的效率优势先后战胜了同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班牙、荷兰、法国,并将后者的殖民地收入囊中。因此,作为后起之秀的美洲殖民者只能依靠自己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体制,而尚未真正弄清公共经济体制的含义却盲目推崇自由与民主的法国(孟德斯鸠,1748)实际上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血与火的革命洗礼都没有能实现文明的转型,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更是用了一百多年的尝试也未能建立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公共财政体系。

正是由于这个难以启齿的种群生存竞争背景,当以英美为先锋的欧洲人凭借新的公共经济体制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们并不愿意把自己有效的公共财政体制^①强加于被占领地区,而是更热衷于用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来腐蚀当地的传统文明体系与公共经济制度,并把教化的重心放在构建有利于扩大本国市场规模的微观交易机制上。而这也正是敏锐的东方学者强调文化溶血不可能的真正背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泛西方文化的批判并“不是一般性地批判现代性”(赵林,2005),而恰恰是要在公共财政体系的基础上追求现代文明与国家体制的转型。

当然,由于现代文明的核心表现为以宪政与议会机制为基础的公共财政制度,因此无论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学习是否到位,缺乏公共财政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解决落后国家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战争能力或种群生存竞争能力迅速提高的问题。事实上,不仅以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的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传统公共经济制度——专制政体的失败,而不是儒教文化的失败,而且以英国人的入侵为标志的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同样是传统的政教合一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失败,而不是伊斯兰教文化的失败。事实上,作为一种精神慰藉的知识体系与无效的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与佛

^① 一个在近代的种群生存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的公共经济体制,它以纳税人决策为基础,以大纳税人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为导向,以市场扩展为目标。

教,它们的本质追求并没有区别,尽管它们服务的对象截然不同。但西方近代构建的公共财政体制却明显比东方传统的帝国官僚体制和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拥有优势,因为公共财政体制在国家支持企业、企业创新技术、技术支持国家的良性循环中迅速提高了国家的战争能力或种群的生存竞争能力。

确实,由于公共经济体制的比较优势最终只能体现在战场上,落后国家的有识之士的认识提高也首先来源于战场上的对比,正是“这场(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似乎不在于军事上的落后,而在于政治体制方面的陈旧”(赵林,2005)。

事实上,今天被全世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在种群竞争的战争中曾经获胜的民族^①,而获胜的关键就是建立了独立的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制度——表现为贵族集团统治或专职官僚集团统治的国家体制。正是这些专业化的统治集团或公共经济体制的效率优势决定了该民族能在生存竞争中获胜从而被历史所记录,并最终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文明古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各地的人类祖先才会在经过了反复的试验之后都得出结论:在提供种群生存的公共产品方面,在生存竞争的战争中,松散的部落民主体制远不如集权的专制政体更为有效,因此专制的集权统治就成为世界各地成功的民族殊途同归的共同选择,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的政治体制。^②正是为了追求部落种群的生存,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治家才会百折不挠地进行了反复的政治改革,试图放弃原有的部落民主政体,通过构建集权专制的政体而进入古代文明社会。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专业化的公共经济制度诞生与转型的历史,而由于国家政治制度曾经是公共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因此人类历史才长期表现为年鉴学派不愿意承认与记录的“君王历史”,^③历史学家们才会对专制君王的战争与统治活动非常感兴趣。以至于无论是阿庇安的罗马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还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所有这些著名的史书都是关于国王与战争的历史;无论“传统史学基本上表现为族类记忆和国家记忆,而族类记忆以皇族为中心,国家记忆则以王朝为中心”,还是“现代史学”开始“向现代主权国家记忆和公众自身记忆发展”(陈淳,2007),对种群生存的关注与对能确保种群生存的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制度的追求始终是文明世界

① 中华始祖炎黄部落战胜蚩尤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商人部落的取胜、周姜部落联盟的取胜都是这一故事的延续。

② 人类最早对这个问题开始有意识的理性思考,是从埃及法老开始的,尽管表现为统治方式的探索。埃及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en),反思了希克索斯(Hyksos)入侵带来的13~17王朝的混乱割据历史,在公元前1375~1358年间主张改革多神并存的宗教混乱局面,他认为神作为秩序与部落生存的保护者,应该统一起来凝聚力量,内部的冲突与斗争削弱了埃及应付外敌的力量。然而由于传统势力的反对,再加上埃及的地缘政治对统一并非迫切需要,因此,一神教的改革失败了。但这个尝试给被抓到埃及的犹太人特别是摩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和门户洞开的中东缺乏任何地理屏障,因此一个精神的凝聚力就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一神教的尝试便在中东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上帝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先后出现在这片动乱不止的热土上。而作为一个反例,无论是早期的雅典城邦,还是后来的波兰王国,缺乏集权统治的公共经济体制的民族都无法在原始的生存竞争中获胜。

③ 正如年鉴学派所抨击的那样:“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郡王史的陋习。”(布罗代尔,2003)

的人类精英们殚精竭虑不断思考的目标。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的出现当然就会表现为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出现,发源于英伦三岛的现代文明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经济制度变迁与转型的结果——全新的更为有效的公共财政体制再次带来了公共经济制度的效率优势与种群生存竞争能力的飞跃。

当然,尽管战争胜利与种群征服仍然是现代文明的首要表现形式之一,但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公共经济制度,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却并不仅仅是种群生存,甚至其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也不是种群生存本身,而是市场的扩张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对海洋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的目的首先表现为对市场扩张的追求,生存竞争与资源争夺仅仅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副产品。因此,尽管在近代“谁征服了海洋,谁就可以征服整个世界”(赵林,2005),但不是为了市场扩张而征服世界的民族与国家,却并没能率先实现现代化从而首先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都是这个领域中典型的反例。因此英美等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领先首先是它们的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它们对世界的征服也是现代文明转型成功的结果,而不是现代文明转型成功的原因。

关于现代文明的本质,或许米勒的看法是切中要害的:“西方从文化的启蒙时期开始进入现代主义,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震撼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米勒,2002)因此现代(市场)文明在与古代(农耕)文明的“争辩”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现代文明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希腊、罗马文明的胜利,更不意味着基督教文化的胜利。事实上,不仅希腊罗马文明是一个典型的古代文明,因此其继承者希腊、意大利甚至法国^①也像中国、土耳其一样在与这种现代(市场)文明的“争辩”中遭遇了失败;而且基督教文化本身也和东方的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一样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因此是与现代文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②

不过,尽管在与现代文明的“争辩”中处于下风,但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市场)文明一样都曾经是文明的一种形态,甚至是更为原初的文明。并且,由于文明要解决的公共经济问题具有时空上的普适性,因此古代(农耕)文明也曾经是一个普适性的文明。^③当然,由于古代(农耕)文明在当代的“争辩”中失败了,因此它被现代(市场)文明所取代就成为人类文明演变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文明的转型其实就是公共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变迁,那么我们会同意,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之间就既不会有观

① 虽然谁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或主要继承者,可能会有争议,但现代文明发源地英国的公共财政体制的核心——议会更多地源自日耳曼,而不是希腊罗马,却是学术界早就达成的共识(戈登,2005;基佐,2008)。

② 米勒用大量事实精确地说明了,西方的传统文化也是集体主义文化和独裁专制政治,而不是希腊文明的民主精神。但米勒没有认识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集体博弈的公共财政机制,而不是市场上的个人主义文化,他误把适合于商业活动的个人主义文化当成了个人主义文明或现代文明(米勒,2002)。

③ 不了解文明演变的这些经济内涵与历史背景,亨廷顿却借助于奈保尔之口,在宗教文化的意义上,强调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亨廷顿,2002;米勒,2002),并试图依次文化的标准来贬低东方文化的存在意义。

念上的文明冲突问题、也不会有概念上的文明共存问题。^① 因为一旦新的更有效率的公共经济体制出现了,所有的民族^②都会愿意选择这个新体制,在这一点上,已变迁成功的发达国家和尚未变迁的不发达国家之间并不会有的大的分歧,真正有分歧与冲突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就像商场中的不同消费者竞争相同的私人产品一样,他们的冲突不是对产品本身有成见,而是对产品带来的利益有竞争)——而这正是各个公共经济制度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文明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落后国家现代化转型——公共财政体制变迁的路径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传统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当然,要构建一个能解释这个文明转型过程的经济模型,必须首先讨论该模型所依据的前提假设,即首先对作为该模型中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人^③的行为目标与模式进行分析。

事实上,正如熊彼特(Schumpeter, 1991)所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的财政活动是人类文明演变历史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演变与转型实际上表现为公共经济制度在效率改进的道路上不断飞跃、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文明的演变与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几乎都可以用公共经济制度的效率来予以解释。同样,历史学家们(布罗代尔,2003;赫尔佐格,1998;埃利亚斯,1999;米勒,2002;赵林,2005;陈淳,2007)也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公共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方式曾经决定着文明演变的方向。因此,对广大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既不是市场的发展,也不是工厂的设立,而是体现为现代国家政体的公共经济制度的构建。

于是研究现代文明转型进程的经济学就必须以公共经济活动为基础来抽象与设定自己的理性人假设与研究范式。但在传统的经济学中,迄今为止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前提始终是个人的自利假设,尽管实验经济学的研究(Henrich et al, 2001; Roth et al, 1991; Camerer, 2001)已经反复表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与现实中的人的行为模式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已经有人认识到“个体行动是内嵌于各种由社会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生成的互动关系中(例如各种社会制度和基因库),个体的本质只有在这些互动关系中才能得到界定”(黄凯南,2008),但个人主义之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仍然迟迟得不到认可,

^① 因此我们既不同意亨廷顿的有意扩大矛盾,也不同意米勒的有意掩盖差异(亨廷顿,2002;米勒,2002)。

^② 当然,各个民族何时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民族的精英何时能说服本国的统治集团执行改革方案,不仅取决于这些民族在旧文明中的成功经验凝结成的传统体制的维持与抵抗能力,而且取决于这些精英们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以及提供的改革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维持了从事专业化公共经济活动的统治集团的相对地位。

^③ 受到与管毅平教授讨论的启发,我们把模型中的行为主体确定为理性人,而不是经济人。理性人的内涵很简单,即在面对任何可能的选择时,根据自己的效用判断进行了主观抉择的人,当然不需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作为判断依据的经济效用未必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收入。

以集体经济行为为对象的集体主义研究范式始终没有出现。^① 现有的经济学研究,要么是仅仅以近一百年发达国家典型的 Kaldor 经济事实 (Barro & Sala-i-Martin, 1995、2004) 和人的行为模式作为研究的起点与基础,而忽略影响人的行为的制度因素;要么在研究制度的过程中把重点放在什么样的制度才有利于经济增长上来,而忽视有利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忽视制度变迁过程中人的集体博弈与集体行为模式分析。

显然,如果我们把各个类型的社会中人的行为都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把那些仍处于渔猎、游牧与丛林之中的原生态社会中的人也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就像 Henrich (2001) 的拓展性实验所尝试的那样,那么个体主义的行为方式与自利最大化的前提假定就不再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甚至也不再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统计规律,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甚至是集体生存的集体主义文化就会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行为模式,而影响这个行为模式生成的外部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就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讲,文化生成必定受制于自然环境,亦即在原初的状态中自然环境可能是唯一的解释参数(或外生变量)。”(黄凯南,2006)只不过,这个外生的环境在人类处于相互隔绝的早期仅仅限于自然环境,等到人口的增加使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人与人的资源竞争不可避免时,这个外生的环境已逐渐演变为更加凶险的人和人竞争的地缘政治环境。

事实上,在公共经济制度诞生的前文明状态,人和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和群居的食草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何用群体行为的方式适应不同的环境并确保种群生存延续下来始终是人类和其他食草动物一样的首要群体行为目标。当然,各个动物种群适应环境的能力主要依赖于凝聚在基因密码上的经验积累。但正如黄凯南所强调的那样,由于基因传承难以适应知识与环境的迅速变化(黄凯南,2008、2006),因此很多能力卓越的物种先后灭绝了,只有那些综合适应能力强的物种才得以生存下来。而人类的遗传基因尽管并不具有先天的优势,但人类发明的语言却通过知识积累与制度构建创造了一种体外的经验积累传承方式,于是制度构建与变迁逐渐成为人类弥补基因缺陷 (Arrunada, 2008) 的一种外在努力,而作为文明体现的国家政治制度的生成正是这样一种努力的结果。

当然,由于近百万年来人类生存竞争经历的影响,早期外部的制度选择就和内部的基因本能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追求种群生存为目标的,因此在文明演变的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的制度变迁探索很少能意识到发展问题。只是以英美为首的现代国家出现以后,特别是二战之后的飞速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的生存问题几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之后,以个人为基础的个性发展才成为人类精英思考与制度选择关注的核心,以美国的个人主义行为模式为基础的行为模式才成为真正的主流。事实上,只是到了现代化转型成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才经历了相互冲突的弱势群体生存目标与市场主体发展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 (Etzioni, 1988),并在大纳税人决策的宪政体制中强调市场经济主体追求的发展目标,而渐渐忘掉了自己早期的重商主义政策曾经追求的生存竞争目标。正是由于对生存目标的

^① 关于集体行为的经济学含义,奥尔森(1995)的研究与爱泼斯坦(2000)的努力曾经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但集体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宋丙涛,2011)。

忽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才不仅无法解释文明转型的动力与国家制度变迁的缘由,无法抽象出公共经济学自己的人类群体行为的假设前提,而且也无法解释现代民主政体的出现及选举过程中的“非经济理性”偏好(Caplan, 2007);也正是由于对生存目标与人类早期群居生存方式的忽视,现代经济学才无法解释大量存在的支撑公共经济活动得以“非理性”进行的利他主义集体行为偏好。

事实上,在国家制度变迁与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人的行为并非总是由个人享乐偏好所引导的,相反,和大量群居动物类似的种群或集体生存的偏好曾经是引导人类制度选择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且,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生存方式,许多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人类反复颂扬的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实际上在许多群居动物的社会与繁殖方式中也经常被观察到(如舍生取义跳下山涧的跳羚)。

当然,即使在这样一个追求集体生存的集体主义文化中,面对共同的行为规范,各个个体的行为选择也并不一致。然而,“以往主流的制度理论通常只考察个体对制度的选择,而忽视了制度对个体的塑造”(Hodgson, 2007)。事实上,“大多数的个体的认知都受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塑造,只有少数的文化精英会对此进行反思”(黄凯南, 2006)。这些精英就是大猪原理中的大猪代表。但由于集体决策与集体博弈研究的滞后,不同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差异,特别是“精英选择制度,制度影响大众”的大猪博弈逻辑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

尽管“Wright(1945)指出,通过引入群体选择,利他主义者就能够在群体选择中保留下来”,并意识到利他主义对于种群繁殖、群体生存的意义,但他不仅“没有详细探讨群体间的关系”,更没有在探讨利他主义的群体利己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群体内部选择的集体博弈分析,而且“对群体选择的定义是从个体选择的定义中引申出来的,并且将群体类比于个体,这很容易造成误解”(黄凯南, 2008),特别是无法解释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政治制度的演化与选择。Smith(1964)的模型虽然考虑了群体内的集体博弈,但没有考虑集体内部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文明转型的关系。

事实上,在国家制度变迁与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当群体间的竞争极为激烈而且群体间的人员流动极低时,一些富有集体荣誉感、道德感和忠诚等的利他偏好可能得到演化……此时个体选择力量微不足道”,“当然,如果群体间的竞争不激烈,群体选择力量下降,个体选择就会发挥作用”,“因此,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力量对比决定了这种社会制度演化的方向”(黄凯南, 2008),而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则决定了群体间的竞争是否激烈。

当然,无论环境决定的群体竞争格局如何变化,任何一个社会内部的所谓制度演化过程,都是社会内部的精英在群体内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的过程,就像商鞅变法、耶稣立教一样,而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客观过程。只不过有的构建尝试恰好适应了当地的环境需要而得以延续,有的构建尝试因为不符合环境条件而被淘汰。正如“传统的均衡理性”“将人视为神”一样,历史中的人们正是把构建制度的精英尊为神,耶稣、炎黄大帝等都是这样被神化的。有理性的精英就是神,但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是有理性的精英,所以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不能解释制度的由来。同样,把自然尊为神灵、只承认基因传承与自然选择的演化群体主义也无法解释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与动力机制,只有以精英为核心的集体博弈理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才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发 展在经济效率方面的进步是由不断累积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带来的。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观点却只是强调生产过程中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带来的技术进步,而对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人类社会大分工——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之间的分工却重视不够。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首先出现的社会大分工就是专业化公共经济活动的出现,即公共产品的生产从部落集体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社会管理组织出现的经济基础。

其实,学者的研究早已表明(摩尔根,1997;宋丙涛,2001),在前文明时期,经济活动首先表现为产权无法界定的公共经济活动,人类社会的文明前历史首先是一部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不加区分的部落集体公共经济的历史。只有那些最先在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间实行了专业化社会大分工的部落才出现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萌芽,更为准确地说,是那些少数人首先从集体性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的部落最先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并以社会管理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几乎所有的人类群落,甚至是某些动物的群落,都曾实现了暂时的分工与局部的专业化训练,但只有那些将公共经济的分工与专业化进行了制度化安排并构建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的民族才最终将文明的曙光转化为辉煌无比的文明。

在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基础上的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效率的提高既表现为公共产品提供的稳定与公共产品成本的减少,也表现为公共产品数量、种类的不断 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公共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带来了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率的提高导致了常设性的社会管理组织的出现。日常的专业化的社会管理活动的出现引发了一万前开始的农业技术革命,并使社会管理活动的内部分工与细化成为可能。特别是为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员提供生活资源保证的稳定税源与财政体制的出现,以及专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的僧侣阶层与世俗贵族阶层的形成为人类文明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与制度基础。^① 大约五六千年以前,建立在世袭贵族垄断与僧侣巫师垄断基础上的专制国家相继开始了古代文明的尝试,并在水利条件与农耕技术的基础上先后演化成形式各异但内涵相同的古代文明古国。文明古国的扩张与发展推动了农耕技术的传播与古代文明的扩散,并很快使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出现了剩余,于是以巩固专业化统治集团的垄断地位为目的的大型“文明形象”工程与以统治集团享受为目的的商品交易活动成为各个文明古国的共同追求,并导致各种文明古迹的建成与以服务统治集团为目的的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

只不过,西方的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对人类文明演变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产业革命爆发之后的最近两百年间,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甚至只是把二战之后的美国模式作为文明的唯一模式,他们不仅忽视了早期人类活动追求生存目标的经济意义,而且

^① 经济史学界曾经有一批文献(Bonney, 1995a; Bonney, 1995b; Bonney, 1995c; Ormrod and Barta, 1995; Ormrod, 1995; Gelabert, 1995; Hocquet, 1995; Isenmann, 1995; Henneman, 1999; O'Brien and Hunt, 1999; Ormrod, 1999; Bonney, 1999a; Bonney, 1999b; O'Brien, 1998)集中讨论了欧洲内部的财政体制与财政国家对欧洲近代文明诞生的基础性作用,但他们的欧洲中心论视野使他们忽视了东方文明的早期探索、成功与制度性贡献。